

史上最贵的一次搬家

◎魏辉

2011年6月4日晚,北京保利春拍正在进行,现场气氛热烈而紧张。当那晚最引人瞩目的幅古画出场时,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拍卖师报出的开槌价是1亿1千万元,众藏家争相加价,经过19次叫价,这幅古画以3.5亿元拍出。加上佣金,最后的成交价高达4.025亿元。

身价四个亿!这是当年拍卖行成交最“贵”的一幅中国古画——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画的是东晋名士葛稚川移居罗浮山的故事,有人议论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贵的一次搬家了!”

这是一幅有故事的画。

◆ ◆ ◆

我们先从这幅画的主角葛稚川的故事讲起吧。

葛稚川这个名字估计知道的人不多,但是说起葛洪,大家应该熟悉。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的名字和故事多次出现在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中,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对于道教炼丹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葛洪出身于江南士族,13岁丧父,少年时期刻苦读书,涉猎广泛。他约生于公元283年,卒于363年,当时,中国大地上豪杰并起,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葛洪在年轻的时候参过军打过仗,被封为“伏波将军”,后来当过地方官。公元327年,葛洪出任广西北流的县令。赴任途中走到罗浮山附近,由于当地官员的挽留,说可以提供给他炼丹的材料,于是葛洪决定携家带口半路辞官,跑到罗浮山隐居。此后他在山中潜心修行,著书讲学,终其一生。

《稚川移居图》画的就是葛洪赴任途中移居罗浮山的故事。

这幅画以焦墨为主,间以浅赭色。画中崇山峻岭,飞瀑流泉,人物点缀其间。画中的葛洪骑在牛背上,身穿道袍,神情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卷。在他的后侧,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一同骑在牛背上,小的孩子被抱在怀里。随葛洪夫妇一起移居的,还有几个仆人,他们或提着鸡笼,或牵着牛羊,或挑着担子。

远处有几间茅屋掩映在深山之中,那或许就是他们未来的家吧。

这幅画将人物刻画得生动有趣。画卷的上方,有画家王蒙的题款,除此之外,还有七位重量级名家的题诗,他们分别是韩性、乐远、陶复初、倪瓒、陆居仁、钱岳、陈则。

几百年间,这幅画历经劫难,它曾被蜚声中外的收藏世家苏州过云楼珍藏,视为珍宝。后来,经过战争的炮火,仍幸运地留存了下来。

物有所值。

其实,同样题材的画,七百年前的王蒙画过不止一幅。现在知道的,流传下来的至少两幅,另一幅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王蒙的题款——《葛稚川移居图》。画的笔墨不尽相同,但都是差不多的内容,不过在故宫博物院的《葛稚川移居图》上,葛洪没有骑在牛背上,而是站在木桥上,一只手拿着羽毛扇,另一只手抚驭黄鹿,仙风道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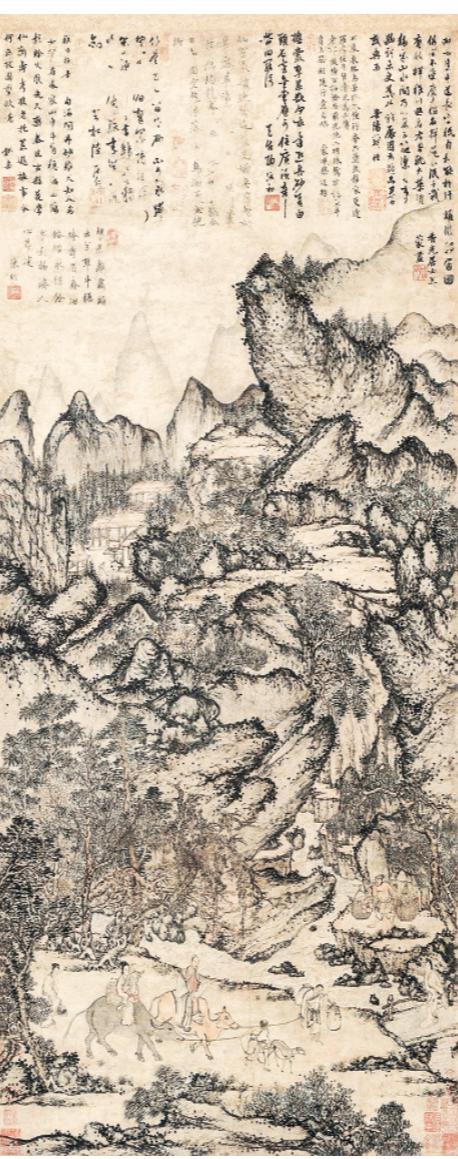
那么,葛洪的移居,为什么王蒙会一画再画呢?

◆ ◆ ◆

王蒙,“元四家”之一。



△王蒙《稚川移居图》(藏于故宫博物院)。



△王蒙《稚川移居图》。

(资料图片)

所谓“元四家”,是指元代四位著名的画家。除了王蒙之外,还有画出《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只傍清水不染尘”的倪瓒和“梅花道人”吴镇。他们四位都以山水画而闻名,对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倪瓒曾写诗称赞王蒙笔墨精妙,认为他可以与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宗炳相提并论,是五百年都出不了一个的人物。

这种夸赞在有的人看来可能有吹捧之嫌,但是在今天,隔了七百年的时光去看,王蒙当得起。因为在中国的绘画历史上,毕竟只有一个王蒙。

王蒙的书画造诣,一是家学所传,二是天赋超人。

王蒙大约生于公元1308年,字叔明,号香光居士、黄鹤山樵,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出生于著名的书画世家。

王蒙的外公外婆比他的名气还要大。他的外公是赵孟頫,著名书画家,诗人,被誉为一代宗师,“元人冠冕”,他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一起,被后世称为楷书四大家。王蒙的外婆管道昇是有名的才女,聪敏过人,能书善画,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王蒙的舅舅赵雍、赵奕,表弟赵彥深都以书画知名。

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估计童年的玩具都是笔墨纸砚吧?王蒙自幼能写诗文,工于书法,画画更是深得家传。

王蒙的画往往构图周密繁复,纵逸

多姿,笔墨繁密松秀。他独创了“水墨墨章”的表现技法,常用皴法,尤其多用解索皴和牛毛皴,用来表现山林峰峦的郁茂苍茫。人们评价他的画——“元气磅礴”“纵横离奇,莫辨端倪”。

王蒙的画作流传至今的,除了《稚川移居图》,还有《青卞隐居图》《谷口春耕图》《花溪渔隐图》《秋山草堂图》等。后世的画家很多人模仿王蒙的画法,特别是明代与清代的画家,大多都受到他的影响。

作为一名江南的世家子弟,才华横溢的儒家知识分子,王蒙的生活并没有“春风得意”,他心中总是在纠结。

◆ ◆ ◆

王蒙在纠结什么?

这要从他生活的朝代说起——元朝。

蒙古贵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在各种政策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汉人地位低下。打仗需要钱、需要粮食,军费的来源就是压榨平民。而入被压榨到没有活路的时候,就会揭竿而起。所以,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江南的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一股隐逸之风,他们想要安稳一点儿的生活,于是纷纷放弃出仕的理想,回归山林。作为深受儒家教育的文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他们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理想,无疑内心会有忧愁苦闷和各种纠结。

难道,一辈子就要不为人知地老死在这片荒野山林中吗?外面还有没有机会能做一点儿事情呢?名门世家的家族声望在我这一代就中止了吗?

王蒙经常会陷入这样的矛盾之中。

他断断续续地做过元朝的一些小官。然而,政治的黑暗、人民的苦难,让他深感无力,总是做不了多久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再到山中隐居。加上农民起义时不断地发生,他时官时隐。他曾经隐居在黄鹤山(今杭州皋亭山)几十年,自号黄鹤山樵,过着“卧青山,望白云”的生活。

在做官与隐居的纠结中,王蒙经常会想起葛洪。

王蒙与葛洪所在的年代相隔久远,但都生活在一个战乱不断的社会,而且他们俩都是名门出身,饱读诗书,经历也相似。在那些时官时隐的岁月里,王蒙深深地共情了葛洪。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画着葛洪移居的故事。

他画的不只是葛洪,也是画的他自己。

王蒙喜欢结交风雅隐士,也喜欢结交权贵豪杰。很多朋友劝他:算了吧,离那个残酷的官场远一点吧!

比如倪瓒,还赠给王蒙一首诗:

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

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

倪瓒的话说得很实在——老弟啊,在哪里还吃不上一碗饭啊,不要去做官家的奴隶,你没见范蠡的结局嘛,还不如一个钓鱼翁呢!

这些话王蒙听到了,但并不入心。

元朝末年,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据浙西,王蒙曾应聘为理问、长史。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朱元璋招募江南人才,听到这个消息,王蒙又心动了。

选择不同,命运便会不同。朝廷也曾经召倪瓒进京供职,倪瓒坚辞不赴。而王蒙,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出任山东泰安知州。

到泰安赴任的时候,王蒙的内心应该是欣慰的吧?很多年前,他的外公赵孟頫曾在不远的济南为官,画过一幅《鹊华秋色图》。“济南泰安不远,我终于走上了外公走过的路,也算是延续家族的荣光了吧?”或许这个泰安知州的官职解开了王蒙的一个心结。

既然步入官场,那就少不了与官场上的人打交道。当时大明的宰相叫胡惟庸,他有一次得到了一幅画,想请懂画的人前来看一看,王蒙作为名门画家,当然成为首选之人。这种雅事,王蒙也是乐意去的。

这次观画,为王蒙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明朝统一后,社会不再动荡,但是官场上并不平静。当时宰相胡惟庸权倾朝野,独断专行,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不满。朱元璋是个狠角色,他在公元1380年以“谋不轨”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诛其九族,同时以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很多王公贵族、开国功臣。后来又杀所谓“胡党”的党羽,凡是与胡惟庸有过交往的人,都受到株连,前后杀了3万多人。

1385年,王蒙死于狱中,他的罪名是与胡惟庸勾结。

不知道在黑暗的牢狱中,他是否会想起那画过多次的《稚川移居图》?他终究没有成为葛洪。



青州府花边大套(资料图片)。

棒槌花边原是欧洲传统的手工花边,由编结工艺发展而来。19世纪,欧洲绕线管花边工艺传入山东一带。20世纪,棒槌花边在欧美各国已衰弱,但在中国山东一带却有所发展。据《益都县志》记载,19世纪编织工艺在青州民间已很普遍,“其中尤以花边、发网称著,产品远销欧、美、澳等地”。

棒槌花边技艺是用亚麻布、棉布或混纺布等材料,根据图案设计,在漂白或浅色地布上以手工的方法将花纹部分的经线或纬线抽取露孔,然后加以连缀,形成镂空的装饰花纹图案。地布均由较稀疏的平纹组织构成,以利抽纱绣花。花纹布局是在织物的一角或对角、四周抽出纱条露出孔眼来绣成花纹图案。边缘采用手绕圆形卷边。青州府花边大套分满工花边和锁拼花边两种。满工花边也叫满工货,纯以编织工艺制作。以精棉线为原料,全用细线编织,通过平织、隔织、稀织、密织等手法编结造型,整体凸显“透雕”效果,富典雅高贵之感。锁拼花边也叫锁拼货,以编织花边配锁麻布绣花而成,近似“浮雕”效果。

青州府花边的颜色分白和米两种,共有19种针法,整个工艺细密高贵,工艺流程极具观赏性。这些针法主要用木质棒槌演示,这种貌似儿童玩具的棒槌是青州府花边大套的主要生产工具。它一般由几十个木质棒槌组成,约有10厘米长,筷子般粗细,一头缠线,一头系一串珠珠(起稳定棒槌和坠线的作用),用多少棒槌视花边的繁简程度而定。一般图案用50对左右,多者可达七八十对,甚至上百对。辅助工具为钩针、“包”、大头针等,原料有棉线、亚麻布等。编织时,妇女们端坐案前,将花边图案置于圆盘形草垫上,将金属别针扎刺在图案的各部位,以固定编结的位置和方向,在棒槌上端缠以棉线,将线头拉出,固定在图纸的一定部位。然后巧运十指,以别针为支点,将棉线进行扭绞、缠结,如魔术师般将几十对棒槌来回拨动,使之上下翻滚,交互穿插,绚丽多姿的花纹图案便随之编结出来。不同的图案要运用不同的编织技法。最后拔去别针,将花边从草垫上取下,经过整烫,便成花边单片。编织青州府花边大套,经常运用的针法有密龙、介花、方结、稀布、密布等,这些针法交替使用,便自然产生了稀密相间、明暗交错的艺术效果。

青州府花边编织组织要求严格,必须针法统一,绣制质量达到平、齐、匀、活、光、净的标准,其花边组织法如下:

1. 密龙:首先定好位,所需棒槌为8对。织时四个棒槌为一组,从左到右编织,其中头两个棒槌为主(经线)与其它棒槌交织完成密龙的编织过程。

2. 介花:介花多少、棒槌多少,根据图样大小来定。首先挂头,挂头时一对一挂,四个棒槌为一组,每一对棒槌拧三个劲,从中间两个棒槌开始系一个扣,里面的两个棒槌拧三个劲,与其它棒槌系扣,完成交织过程。

3. 稀布:首先挂头,且一对一挂,四个棒槌为一组,从左向右织。(1)第二个棒槌跳到第三个棒槌与第四个棒槌中间;(2)第四个棒槌跳到第三个棒槌位置;(3)第二个棒槌跳入第一个棒槌位置,完成一个交织过程。

4. 双稀:首先挂头,四个棒槌为一组,从左到右,其中第二个棒槌为经线与其它棒槌交织,编织时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每对棒槌拧一个劲,织法与密龙相同。

5. 方结:用一个手针引入花边线,所有编织过程都在密龙范围内完成。每个穿结完成。穿结的多少取决于图案大小。

6. 关节介花:介花所需棒槌根据图案大小来定,首先挂头,挂头时一对一挂,四个棒槌为一组,每一对各绞三个劲,从中间两个棒槌开始系扣,然后固定一个大头针,用织密龙的方法织,为一个交替过程。

7. 斗子:四对棒槌为一组,从左向右织,第二对棒槌跳入第三、四对棒槌之间,第四对棒槌跳入第三对棒槌位置,第二对棒槌跳入第一对棒槌位置,完成一个搭子过程。梅花果:先织密龙,织完密龙后用一对棒槌拧成辫子,用大头针固定出梅花果的轮廓,逐渐添棒槌密布,织法同密龙做法一致,用密布的经线拧劲,从右往左拧成辫子作为密铺线,然后勾入梅花果的圆圈上,织双稀,完成一个编织过程。

8. 外关针:里关针插针时,插入第二对棒槌里面;外关针插针时,插入第一对棒槌里面。里、外关针用三对棒槌编织而成,织时里面的两对棒槌各拧一个劲,边线拧三个劲。里面织法同密龙织法一致。

青州府花边大套尤其是半成品加工,采用木制棒槌来回交织,双手上下翻飞速度极快,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过程中,一幅幅精美的图案被编织出来。其编织过程本身就极富艺术感染力,具有较强的生动性、趣味性和观赏性。青州府花边大套,工艺精良,组织细腻,图案美观,线条流畅、立体感强,同时配以传统的手工绣花,花纹丰富,间有少数掏眼,虚实照应,凸显产品制作的灵活性和层次感,机械制品无可比拟。青州府花边只有白和米两种颜色,素雅高贵,同时融合中西方文化的艺术特性,珠联璧合,雍容华贵,被誉为“抽纱之王”。

(据《潍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卷》)

寻觅潍博文物中的蛇元素

◎隋炜凤

此铜镜主题纹饰为四枚乳钉间四虺呈环状式排列。

虺,相传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蛇类,不仅生命力顽强,更能汲取天地间的灵秀之气。它们常隐匿于幽深的山林或江河湖畔,以自然的守护者形象,彰显着它们的神秘与尊贵。在古代,虺是生命力、繁荣和富饶的象征,亦被寄寓了智慧和灵性的内涵。

金谭处端书“龟蛇”碑



汉四乳四虺纹铜镜



此碑原立于潍县玉清宫内,后移至潍坊市博物馆。龟蛇合体的形象称“玄武”,玄武与上古神兽青龙、白虎、朱雀合称为“天之四灵”,亦称“四象”,是北方的守护神。此碑上的“龟蛇”二字为金代全真道谭处端真人所书,其将龟蛇的自然之形与道家玄武之蕴,以及自身笔墨之功融为一体,以象形草书挥毫于碑,刻之于石,整体潇洒俊逸,形神兼备。尤其是“蛇”字,蜿蜒盘曲,灵动多姿,极具神韵。

谭处端(1123年—1185年),字通正,法名处端,号长真子,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山东宁海(今牟平)人。金大定年间师从王重阳,为全真道南无派创立者。其“平昔好书龟蛇二字,习而不已,妙将入神,有飞腾变化之状,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为珍宝”。